

序言

黎志添

本書共收入論文13篇，深入探討華人廟宇在不同地區的傳承與演變，涵蓋江南（江浙一帶）、閩南和臺灣、香港、粵西及東南亞等地域。結合比較視野及多元方法，本書從田野考察、碑刻、儀式、傳統習俗及地方社會等角度，探討廟宇在社會中的功能和作用，不但涵蓋華人廟宇的方方面面，更覆蓋廣泛的區域，全面展現華人廟宇研究的最新成果，讀者也可以從中掌握和比較不同華人地區中廟宇的特色和發展差異。

2022年，筆者主持的「香港廟宇碑刻志」研究項目進入收官階段，《香港廟宇碑刻志：歷史與圖錄》也於翌年正式出版。在「上窮碧落下黃泉」式的搜集碑刻、編訂整理和句讀點校的過程中，筆者逐漸萌生了一個想法：世界各地必定有著與筆者懷抱相同熱誠的學者，他們在華人廟宇研究的領域各有卓著建樹。若能將這些學者集結一堂，共論學術新知，實現學術交流，必為一大盛事，也能讓《香港廟宇碑刻志》一書的面世更有意義。於是，筆者開始籌備「從比較的視野看華人廟宇與地方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並邀請研究華人廟宇的同道們參與。17位學者欣然應允參加，他們背景多樣，除了中國內地，還包括來自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亞、東南亞國家，甚至歐洲的專家。雖然會議的議題專注於「華人廟宇」，但參會學者絕

不僅限「華人」，而是包括世界各地非華人的專家，這足以見得「華人廟宇」作為研究主題的廣泛吸引力。

2023年5月12日，「從比較的視野看華人廟宇與地方社會」圓滿舉行；會上，17位學者發表了他們最新的研究，圍繞華人廟宇歷史及演變，以及華人廟宇與地方宗教、地方道教、地方社會、碑刻研究、離散群體等議題展開了熱烈討論，同時再思華人廟宇宗教的研究方法。為了讓這些寶貴的研究成果不局限於會議之內，筆者決定將這批論文編輯成冊，付諸梨棗。雖然書本並非金石，但亦能讓這些關於華人廟宇的研究如碑刻般與學術同仁分享、切磋。

一些學者對於江南地區的廟宇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十分關注。北京大學趙世瑜〈當代江南的「萬神殿」：從水鄉成聚到鄉村都市化過程中的文化整合〉觀察到在當代江南的佛寺道觀中，有種奇特的「萬神殿」場景——周邊水鄉被清拆的鄉間廟宇的神明塑像，被整體移到寺觀中供奉，有如「萬神殿」。從五代兩宋開始，隨著農業發展，江南的水面地域逐漸減少，水上人上岸生活，加上外地人移居此地，聚落不斷增加，形成了「水鄉成聚」的現象，各種社神和土地神的信仰也相應出現。近代以來，隨著鄉村都市化的進程展開，原有的村落消失，社廟也大多被拆除，一些社神、土地和其他神明的塑像被集中安置在佛寺或道觀中，形成了「萬神殿」的現象。江南地區從水鄉成聚到鄉村都市化，這種現象即反映了這一過程中區域社會文化整合，同時也是「標準化」和「多樣化」的博弈過程。作者亦認為，這種「萬神殿」是一種權宜之計，雖然維持了原有村落神明「離土不離鄉」，但也意味著傳統村落和神聖空間的消失。

北京大學劉永華〈清代徽州的圖甲組織與村落儀式〉一文，透過道光十二年(1832)徽州府婺源縣北鄉沱川盆地舉行的祈雨活動，分析了儀式的過程、場所、參與者、物料等方面，指出祈雨活動以圖甲為基本架構。該文回顧了明清時期鄉里組織從里甲到圖甲的轉變，並指出這一轉變不僅反映了國家治理形態的轉型，也涉及到鄉

里組織自身屬性的變動。作者指出，圖甲組織承擔國家的賦稅、徭役等職能的同時，也發展出應對困難和維護利益的制度，如合約、會社、義圖等，從而強化了「圖」作為社會實體的面向。該文進一步探討了鄉里組織參與村落儀式的意義，認為這種現象體現了鄉里組織的鄉族化進程，即鄉里組織不僅是一個基層行政層級，也是一個具有鄉族特徵的社會組織。這種鄉族化進程亦是明清時代社會與國家關係的重要體現，反映了社會組織在處理公共事務過程中的生成和發展，但同時也受到國家政權的深入影響。

復旦大學許蔚〈皇家的大高玄殿與民間的大高玄殿：雙向道上的地方祠神鷹武李將軍〉則關注北京紫禁城神武門外的大高玄殿和江西上饒石人鄉的大高玄殿，這兩座同名殿堂背後的文化意義和社會作用顯著不同，展現了鷹武李將軍從民間到皇家的祀典正神之路。早期，鷹武李將軍缺乏尊崇，僅是靈山石人殿的三位神祇之一。其後，由於祈雨應驗等靈應事件，鷹武李將軍逐漸獲得了地方群體的信仰，並得到地方官員的支援。隨著道院建設和《靈山遺愛續錄》的刊行，鷹武李將軍被進一步道教化，甚至有被封為真君的說法。最後，鷹武李將軍融合了祠神、正神與道教神明三種身分，體現了官方與民間信仰的交融。

兩位臺灣學者探討了閩臺地區廟宇儀式的源流和地方法壇的關係。臺灣國立師範大學謝聰輝〈福建中部請火儀式及其祖殿信仰研究〉透過福建中部的道法壇靖收集的儀式科本與文獻資料，結合實地調查和訪談所得，深入探討了閩中請火儀式及祖廟信仰間的關係，揭示了祖廟信仰和請火儀式在當地道教實踐中的重要性及相互作用。請火儀式分為定期性和不定期性兩種，功能目的多樣，例如節慶、神明誕辰等等。一般由分靈子廟的香主、香會或香客團體發起，並邀請道士或法師擔任儀式主持。參與者通常是祖殿的香主、香會和香客，以及各地信眾。請火儀式要遵循特定的儀節和路線。最後，謝教授探討了請火儀式的內涵，以及其宗教意義和社會功

能，如請火儀式的祖源認同、聖火崇拜、道法傳承、社區凝聚等，並指出在請火儀式中，道士扮演了重要角色，有著重要責任。

中央研究院院士李豐楙〈銘刻信仰：臺南興濟宮的「重修與建醮」記事——道教觀點下的古碑今刻〉一文，探討了臺南重要廟宇興濟宮的碑刻與歷史。作者先介紹了興濟宮的創建時期、地理位置、祀神、建築特色和碑刻匾額等方面的情況，並分析了其與政治、社會、宗教的關係。接著本文探討了不同時代興濟宮修繕與建醮的過程、原因和意義。可以看到清領時期、日治時期和戰後時期的碑刻，在數量、內容、風格、作者等方面都不盡相同，反映了不同時代的社會變遷、文化衝擊和宗教信仰。重修與建醮是一體的傳統，每次重修都會舉行建醮大典，並留下碑銘或醮志記錄。興濟宮的幾通碑刻，如何記錄了修復與建醮的過程、參與者、神明、儀式等，展現了不同時代的文化風格與社會變遷。興濟宮供奉的主神是保生大帝吳本，其信仰在臺灣開發初期已經建立，代表了一境的共同利益和文化，關乎地方社會的認同和凝聚。

本次會議，亦有三位香港學者發表了關於香港地方廟宇的論文。黎志添〈香港地方廟宇儀式研究：道教儀式的廟宇化〉即探討了香港地方廟宇儀式傳統所包括的道教特色（可稱之為地方廟宇儀式的道教化）。《華人廟宇條例》將香港的中國傳統廟宇分為佛教類、道教類和非傳統教派組織的地方（社區）廟宇，並以「地方廟宇」來指稱。這些地方廟宇供奉中國神明，但不具備佛、道教的教派屬性。本文又介紹了香港地方廟宇的數量、分佈、歷史發展和變遷，以及廟宇中主奉的神明種類和數量，如天后、關帝、洪聖、楊侯、觀音等。其中，天后是香港地方廟宇供奉最多的神明。黎教授於2017年開始進行「香港地方廟宇儀式」研究計劃，這一計劃共完成了16座廟宇的27次儀式活動考察，本文概括介紹了幾座香港地方廟宇舉行的神誕和中元法會等儀式，並選取2018年正善精舍主理南安坊廟中元法會（孟蘭勝會）和灣仔玉虛宮的北帝誕儀式，這兩間廟宇的科儀極

具代表性，本文詳細記載並分析了儀式的過程。這些儀式活動主要由香港道觀培育的經生或正一派火居道壇承接，遵循道教的科儀傳統，包括禮懺、禮斗、朝賀、讚星、破獄、攝召、散花、超幽等傳統科儀的程式。在香港，許多地方廟宇供奉的神明之中，有些源於道教的神仙譜系，但另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神明則不屬於道教。本文總結，香港地方廟宇的神明信仰既受到道教神祀儀式傳統的影響，又保留了地方祀神的特色和文化，這也體現在廟宇定期舉辦的大型儀式之中。

珠海學院危丁明〈海角儒蹤：儒教的「異鄉」故事〉一文，講述了香港在英國殖民時期，一批遜清遺老如何在這裡維護並傳承儒家道統和中華文化。辛亥革命後，一些忠於清朝的士人南下香港，尋找安身立命之所。陳伯陶等人利用香港的古蹟，如宋皇臺和三山國王廟，借宋代遺民之思抒發胸中意氣，來重現宋朝的風光，並寄寓對故國和道統的思念和憂慮。晚清進士賴際熙等儒士在香港創辦學海書樓和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以推廣中文教育和傳統漢學，他們與海外華商緊密聯繫與合作，並得到支持和讚賞。這些努力為香港的中文教育奠定了基礎。文章最後指出，這些儒士的努力雖然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但也展現了儒家道統的剛健和尊嚴，對香港中華文化的發展和傳承有重要意義。

香港中文大學馬木池〈英殖民管治時期作為社會控制的《華人廟宇條例》〉一文，介紹了在英國殖民時期，香港不同地區的廟宇成為當地居民的集會場所，籌辦宗教活動、慈善事業和公共服務，並與殖民政府建立聯繫和合作，形成一種地方自治的機制。1928年，《華人廟宇條例》通過，改變了廟宇的財產、收入和管理權的分配，使廟宇由地方居民自主的機構，轉而由華民政務司領導的「華人廟宇委員會」所控制。馬教授以油蔴地天后廟等廟宇為例，論述《華人廟宇條例》對廟宇的興廢、地方節慶活動、社區福利和建設等方面的影響，探討了地方居民對《華人廟宇條例》的反應和抵抗。最初，香港華人

社區透過廟宇公所、廟宇委員會、街坊會等組織，實行地方自治。出於防止廟祝貪污、推廣西醫西藥、控制廟宇財產等原因，殖民政府在1928年通過《華人廟宇條例》，收管社區華人廟宇。《華人廟宇條例》實施之後，地方居民失去了對廟宇的管理權，也破壞了以廟宇為中心的地方自治組織，《華人廟宇條例》對社區建設、廟宇慶典、公益慈善等方面，造成負面影響。

日本茨城基督教大學志賀市子〈扶鸞在中國地方宗教信仰中所起的作用：以粵西地區的神廟為事例〉關注到扶鸞在粵西地區神廟中起到的作用。在清末，飛鸞救劫運動發祥於西南地區，而後席捲中國各地。飛鸞救劫運動是遵守神明透過扶乩降下的神諭，按神明的乩示行善，以期避免劫災的一種宗教運動。在扶鸞的地方性上，該文指出，粵西鑒江流域在光緒年間（1875–1908）陸續出現了鸞堂（扶鸞結社），當地人稱它為「經堂」。經堂的主要活動有扶乩、誦經、印送善書經卷和惜字等。這些活動與扶鸞有密切關係，滲透到地方社會的各個角落。經堂的儀式體系由道教科儀、儒壇概念和飛鸞救劫論述等不同的宗教元素構成，這體現了扶鸞的宗教面相。經堂的神明系統各有不同，比如粵西出現了以玉皇宮主信仰為核心的經堂，其信仰活動也與地方社會的變遷有關。

海外華人的離散社群和地方廟宇的關聯也得到了與會學者的關注。南洋理工大學的蘇泉銘及郭根維〈東亞與東南亞的九皇勝會初探：節日淵源與歷史內涵〉深入探討了東亞與東南亞的九皇盛會的節日淵源和歷史內涵。作者先勾連文獻和口述資料，從而討論神明九皇的身分，以及在不同地區和時期九皇盛會意義的轉變。作者指出，研究九皇勝會，應該比較中國各地與東南亞之間的歷史和跨區域交流，以反映節日的多元性和流動性。要理解節日的變遷和延續，應當充分考慮這兩個區域的政治經濟環境，以及華南社區和南洋華社的共同記憶。明清以降，在不同的地區和時期，九皇信仰的形式和內容也不盡相同，反映了九皇的多元性和流動性。在華南

地區，九皇盛會是一個盛大的節日，有著豐富的民間信仰和文化內涵。在東南亞地區，九皇盛會則反映了華人移民的身分認同和文化傳承。九皇盛會在不同地區的社會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是一個宗教節日，還是社區聚會和文化交流的場所，有助於增進社區凝聚力，並傳承傳統文化。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廖小菁〈「街坊辦事所」：神廟自治組織與英屬馬來亞華人地方社會（1897-1945）〉一文，關注馬來半島霹靂州端洛鎮的華人新客透過何仙姑廟的管理組織，建構地方基層社會，並應對移居地與祖籍國家雙邊的政治動態與時局更迭這一歷史現象。作者利用端洛何仙姑廟委員會的議案簿和帳冊，以及英殖民政府檔案、報刊與民國時期文獻等資料，展示了在移民社區早期形成階段廟宇的角色功能與歷史意義。作者認為，廟宇不僅是華人信仰與文化的象徵，也承載了華人社會的治理機制與身分話語。該文分別從「神廟與地方社會」、「神廟與地方政治」、「神廟與國族動員」三個層面，分析了何仙姑廟在端洛華人社會中的多重功能與意義。何仙姑廟不僅是端洛華人的信仰中心，也是端洛華人的社區中心，承擔了教育、福利、公共衛生、防疫、防火、維安、土地管理、義塚保護、社會仲裁等各種公共事務。何仙姑廟也是端洛華人的政治中心，與英殖民政府、馬來王室、馬來人、印度人、日本人等各方勢力進行協商與抗爭，維護華人的權益與尊嚴。何仙姑廟更是端洛華人的國族中心，參與了中國國民革命、抗日戰爭、馬來亞獨立運動等各種國族動員，展現了華人的愛國情操與國際視野。作者認為，何仙姑廟是端洛華人社會的「街坊辦事所」，展現了華人的共同體意識與身分話語，是一個具有現代性意義的自治組織。

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莫家浩〈殖民治理環境下的柔佛古廟遊神傳統形塑（1920-1948）〉關注1920到1948年這一時期之內，柔佛古廟遊神的形式、內容和意義如何被外界因素影響，這些因素包括英殖民和日據時期的政府治理因素，以及柔佛巴魯華人社會的內部互

動等。作為柔佛巴魯地區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廟宇，柔佛古廟每年舉行的遊神活動已經是柔佛巴魯華人社群重要的文化活動和身分認同象徵。從英殖民到日據時期，柔佛古廟遊神因為政治原因和華人社會內部討論，發生了種種變遷，特別是在中國爆發抗日戰爭之後，是否節約遊神經費以支援華人的祖國抗戰，成了華人社區討論的議題。在日據時期，日軍為了粉飾太平和宣傳東亞共榮秩序，遊神的規模變得更大，在戰局之下，柔佛古廟遊神權宜時局，故作姿態的表現，反而讓遊神的儀式標準化，並讓遊神儀式成了戰後柔佛巴魯華人文化身分認同的現實參照物。

廈門大學蔡志祥〈生與死的連繫：墳山、廟宇、儀式與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一文，以新加坡的碧山亭為例，探討了分析了墳山、廟宇和儀式在早期移民社會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們如何受到殖民政府、都市發展和人口變化的影響。該文先介紹了碧山亭的成立背景、管理架構、墳地分配等方面，及其如何服務廣惠肇的成員和其他華人群體。接著，該文論述了萬緣勝會的儀式和意義，詳細描述了萬緣勝會的儀式流程、參與者和執行者、收支記錄和碑刻文物等，萬緣勝會聯繫生者與死者，弘揚孝道慈善，配合國家話語與和諧理念。蔡教授指出，《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收錄了碧山亭64項的碑銘文物，其中10通都記錄了1920年代以來不同時期舉辦的萬緣勝會，從這些碑刻可以看出儀式的連貫和變遷。透過不同載體上關於碧山亭萬緣勝會的官方論述和記錄，可以看到始建年份、間隔時間、儀式執行人、儀式內容和社會意義等方面都各有不同，可見在不同的時代，同一儀式如何應對宏觀環境的變化，以及如何聯繫生者和亡者，達至為生者的幸福和文化服務的目的，並且弘揚孝道和宗教慈善的價值觀。

透過以上種種，本書的議題之廣泛深入，讀者當可窺見一斑。當中，雖然不同地區的華人廟宇之間存在相異的發展面貌，而各自的社會文化和宗教儀式也有不同特色，但是，「華人廟宇研究」這一

學術領域的豐富性，卻能為學術界對不同地區的華人社會、政治和宗教研究，提供另一種特別和有價值的視角和珍貴的材料。我們期待本書的出版，能激勵更多學者共襄盛舉，進一步挖掘和探索華人廟宇的豐富奧秘。最後，筆者特別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協作研究計劃——「嶺南文化與世界：廣東文人文化景觀的建構及轉變（1821-1949）」（C4006-22GF）的支持，為筆者主持的「嶺南廟宇文化在不同華人地區發展」的研究確立基礎，也為進一步的跨地區分析和比較，提供極具價值的研究方向和合作機會。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